

社会温情：福利社会的兴起

郭少琼 著



从个人善举到宗教救济
从慈善事业到歧视性援助
从政府统筹到社会责任
社会福利的千年历程

A 世界史纵览
Survey of World History

社会温情：福利社会的兴起

郭少琼 著



長 春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温情:福利社会的兴起 / 郭少琼著. —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0.1
(世界史纵览)
ISBN 978-7-5445-1149-0

I.社... II.郭... III.社会福利-历史-世界-通俗读物 IV.D5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8298 号

世界史纵览

社会温情:福利社会的兴起

著 者: 郭少琼

责任编辑: 张耀民 程秀梅

封面设计: 徐力坚

版式设计: 王国擎

插图作者: 尹小光

出版发行: 长春出版社

总编室电话: 0431-88563443

发行部电话: 0431-88561180

邮购零售电话: 0431-88561177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 130061

网 址: <http://www.cccbs.net>

制 版: 长春出版社美术设计制作中心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17 千字

印 张: 12.2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8.00 元(全 20 册)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010-60292266

总 序

中国需要世界史知识的普及,因为她正在走向世界。

中国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与世界频繁交往,交往的广度与深度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根据我国外交部的统计资料,截至2009年7月,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总数达到171个,遍及全球。中国与世界的人员往来也更加频繁。根据国家旅游局的统计,2008年我国出入境旅游总人次接近1亿(其中,入境5305万,出境4584.44万)。据教育部的统计,从1978年以来,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139.15万,2008年创了历史新高,达到17.98万;其实,早在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统计数字就已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出国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全世界几乎每7个外国留学生就有1个中国学生。中国也受到了海外留学生的青睐,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累计接收来华留学生146万人次,2008年首次突破20万,共有来自189个国家和地区的22.3万来华留学生。经济交往更为繁盛。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的统计分析,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的开放,2004年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迅速提高,2003年就突破了50%,2006年达到67%,2008年尽管开始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

超过60%。伴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世界也在迅速走进中国。中国与各国的交融与冲突也日益加深。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不但加速了中国从货物输出国向资本输出国的转变,而且还使中国日益卷入国际贸易纠纷之中。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更多地了解我们所打交道的对象,了解他们的历史文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与文化特征。

了解外界,学习世界历史是眼前现实的需要,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则是培养21世纪国民基本素质的需要,很明显,现代国民一定要有世界眼光。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不仅是在战场上、在商场上、外交谈判桌上,乃至日常友好交往中,概莫能外。优雅、良好的国民和政府形象,既需要经济实力,又需要优良的文化素养,其中中外历史文化知识当然不可或缺。此外,学习外界文明与文化,也是改善我们自己文明与文化的需要。应当承认,上述对外交往和对外商贸的成绩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古人亦云,“择善而从”“从善如流”,似指个人修养的一个重要原则,何尝不能用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历史证明,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是铁板一块,完全的、纯粹的原生型。交往促进发展,共融产生文明。但凡文明,特别是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文明,都是在碰撞和交往中产生,又在不断交往中发展与共生。现代国民和国家尤其应当有一种开放和自信的心态。开放不会失去自己,只能使我们更加丰富,更加健康。

人类社会不同地区的交往很早就开始了,但真正把世界逐渐连为一体的还是新航路开辟以后。此前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交往大多是局部的、暂时的,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各地人们不可避免地发生联系,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是主动还是被动。中国最初与现代世界的交往就是被动的,甚至是屈辱的,那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鸦片战争。从此自以为天朝大国的政权再也不能无视外面世界的存在。林则徐自觉“睁眼看世界”,表达了那一代中国仁人志士最明智的判断和认知。此乃

痛定思痛后的反思：泱泱大国败于远渡重洋而来的蕞尔小国，气难咽，恨难消；可为什么会输掉？又如堕烟雾，一筹莫展，开战前林则徐甚至认为英国士兵“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参见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七月奏折《请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遑论对手的军事火力、武器性能、游戏规则乃至心理与文化！林则徐之痛，是国人之痛，民族之痛！痛苦促发顿悟，从而记录了中国人的—次惊醒，弥足珍贵，事实上它也的确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逐渐认识世界，同时重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有不曾间断的文明，很久以来即以天下之“中”自居；然而，此时发现我们的武器库中两样家什至为罕见，甚至不曾拥有，那就是“科学”与“民主”。这是天大的发现，是经过剧烈的文化碰撞和苦难洗礼后迸发出的社会思潮，大概也是五四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依当下的看法，对西方的这种认识未必准确，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评判亦不无偏颇之处，但无论如何，比之前辈的认识水准无疑大大迈进了一步。这是真正历史性的进步，面对“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产生了数千年来未有之眼光。或者说，面对—个不同的文化参照体系，直面自身，重新评估了自己的形象。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解外来文化的另—个重要价值：在比较中产生鉴别，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从而试图改善自己。

对外界文化的研究，我国学术界曾问世过—些相当不错的著述，如前不久人民出版社以《西洋史系列丛书》方式再版了9种专著，可见一斑。不过，系统的世界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和世界史教育的普及，总体讲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打破旧的思想樊篱，走出一片新天地：大量的国外研究成果被译介，许多研究领域被开拓，陈旧的知识体系和概念被更新。世界史学科正在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重要的思想和学术资源。而且，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成果也正在逐渐缩短与国际水准的距

离。每年,应该说每天,都有从研究对象国归来的学人,一些原始资料开始能从网络上直接获取,一些领域甚至可以做到与国外学者直接对话。毫不溢美地说,世界史学科的进步是出类拔萃的,中国世界史学科进入了春天。

一线的研究成果需要系统地梳理,细细地消化,而且应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和吸纳。世界史学者有这样的责任,中国也存在相应的文化市场需求。近些年,已经有一些简明的世界史读本面世,这些著作图文并茂,为传播世界史知识做出了贡献。但总体而言,我们的世界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仍然比较薄弱,尚存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世界史纵览》这套丛书,试图向大众传播鲜活的世界史知识,注重世界历史的主线与全局,注重社会生活史元素,注重行文风格的灵活轻盈。这套丛书的作者大多为中青年学者,他们有自己的优势,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很多缺陷。真诚地希望前辈学人对这些年轻学者予以指教,使之更好地成长;更真诚地希望他们的劳动成果为更多的国人分享。

侯建新

于天津师范大学欧洲经济—社会史研究中心

2009年10月25日

写在前面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基佐在其著作《法国文明史》中提到：“文明主要包括两点：社会状态的进展，以及精神状态的进展；人的外部条件和一般条件的进展，以及人的内部性质和个人性质的进展。总而言之，是社会和人类的完善。”也就是说，所谓文明，就是社会不断进步、人类不断完善，获得全面发展的过程。而社会的进步、人类的完善是一个漫长且错综复杂的过程，我们只能从一些生活侧面、社会现象感悟社会的进步、人类的发展，感受文明。西方社会福利的发展及其带来的影响恰好为我们见证文明、感受文明提供了一个契机。

帮助穷人、关爱弱者是人的本性，是人类朴素真挚的感情流露，而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由来已久，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从西方国家社会福利政策发展的历程来看，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私人领域的福利职责，排斥教会、地方权力、个人以及社会力量，建立起由国家负责的全民社会福利体系。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新科技的进步、知识的发展以及福利体制本身的缺陷，西方国家滋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福利国家出现了危机。于是，西方国家开始寻求新的发展道路，政府转而倡导并推动社会、地方组织及个人等更多地承担福利职责，提出了积极的福利改革，主张建设社会投资型国家，积极倡导“无责任即无权利”的新原则。西欧各国社

会福利体制正处于改革阶段。

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开始形成以前,西方国家主要是通过教会、地方组织和个人的施舍、宗教救济等方式来帮助社区中需要帮助的人群,这包括了贫民、年老体弱者、寡妇、婴儿以及生理上、心理上有缺陷的人等。这时期的社会救济纯粹是个人善举、社区间的友爱体现以及宗教救济,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甚至可以说这时期的社会救济纯粹是宗教事务,是对上帝表达虔诚与敬爱的外在表现。

众所周知,西方社会中的许多传统和做法是受到宗教思想影响的。古埃及的经典宗教文献《死亡之书》中写道:“我给所有饥饿者以面包,我给裸露者以衣裳。”这里的神是乐善好施的,而且往往把帮助人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而《旧约全书》中到处充溢着诸如“不能让穷人空手而归”的劝人为善的说教,竭力向人们灌输这样一种观念:给予是责任,而接受则是需求者的义务,同时,给予应当以需求为前提。比如说缺乏食物了,就应该给他吃的;没有衣服了,就应该给他穿的,等等;《新约全书》中也经常会有诸如“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定财宝在天上”等语句。正是在诸如此类的说教影响下,乐善好施、慷慨救济被看成神的旨意,是义不容辞的个人责任。社区中人与人互济互助,行会、兄弟会等大做善事;富人仗义疏财,大量馈赠其依附者以及教会,教会更是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救助穷人、保护弱者的责任,甚至将之看成理所当然的社会职能,并逐渐合法化。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朴素的情感与爱。然而,这种主要由教会承担的社会救济,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富人缘于自身的救赎而救济穷人,因为后者是在上帝面前最好的说情者;而教会借着对穷人的救济控制其生活方式与思想,并试图凭此与政府抗衡;行会、兄弟会等慈善机构则为了表达对上帝的敬爱,遵从上帝的意愿而积极从事慈善事业。弱势群体成了富人阶级升上天堂的阶梯,成了教会、地方贵族权力的筹码,成了被利用

的工具。与此同时,富人因赎罪而慷慨救济,教会获得馈赠而救济,行会、兄弟会为了坚守信仰而救助,因而,这样的社会救济带有很大的机动性、随意性。当天灾人祸,穷人现象特别突出时,富人、教会等会因自身经济匮乏而减少甚至停止救济行为,穷人的境况更糟,其最低生活保障并没有得到保证。

随着16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和宗教改革的进展,政教不断分离,西方各国过渡到民族国家,开始注重社会政策,制定了一系列法案(如英国的“济贫法”)对穷人进行带有歧视性的援助,开始区分真假穷人,兴建了大量的收容所、感化院,实行大禁闭与驱逐政策,将大批“无益于世界”的穷人、流浪汉关进了收容所,从而将他们与社会隔离开来,以此来维持社会秩序。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工业革命、宗教改革冲击着教会、封建领主对社会的控制和封锁,使得其在社会救济领域所起作用有所下降;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兴起使西方各国越来越注重国家对社会各领域的干预,维护社会秩序井然几乎成为新兴民族国家的头等大事。教会、地方政府被要求停止对“无益于世界”的穷人、流浪汉的怜悯与帮助,王室开始介入社会救济领域,慈善机构出现了世俗化趋势,社会福利成为民族国家排挤、压制穷人、流浪汉的一面幌子。然而,在此过程中,传统的宗教救济、慈善事业并非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

到了近现代,尤其是十八九世纪,伴随着中央集权的发展,政府越来越多地干预社会福利事业。国家通过不断地制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几乎独揽了社会福利事务,将教会、地方权贵以及个人、家庭从传统的社会福利领域中排挤出去,社会福利由国家负责管理。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与教会、地方势力就社会福利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社会福利被扭曲了,成为双方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与此同时,穷人、流浪汉等继续遭受禁闭与驱逐、镇压,成为政治整饬的受害者,社会福利让位给社会秩序。

由国家制定并负责实施的社会保障制度破坏了传统的社区友好关系,削弱了地方归属感,削减了人与人之间朴素的真诚的

友爱情感,将对他人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推给了政府,人与人之间开始变得冷淡、麻木。然而,这并非全是社会福利制度的错。实质上,国家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福利制度,保障弱势群体最基本的生活,并给予了强有力的法律保证。国家正是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强制性地给予弱势群体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赋予其不可剥夺的现代公民权利,而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宗教救济那么随意,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社会福利是一项不可动摇的公民权利。这意味着国家把弱势群体当成整个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民族国家必不可少的一分子,同时承认每个人都有生存权利,而国家有责任保障这种权利,这是人类文明向前迈了一大步。国家承担起帮助穷人、保护弱者的社会职能,并为之创造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空间与条件,使人性得以张扬,社会因之大步向前迈进,同时加强了弱势群体的民族归属感与国家集体感。社会福利已从中世纪以来的宗教事务演变成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府职责,是一种司法行为。在此制度下,弱势群体被看成一个完整的人而得到尊重与帮助,不再是被利用的工具,不再是扰乱社会秩序的危险分子。而福利制度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生疏,认为只要交了税就没有责任了,是国家、政府的职责,这并非完全是社会福利制度所造成的,而是西方国家近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弊端。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利益、物质享受,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们把目光集中在社会生产、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却忘了关注人类自身的发展。但是人类本身的发展与完善才是社会进步的本质,人们应该把目光收回来,投注在人类本身,关注人,关注自我发展与完善。福利制度是为了保障弱势群体的生活,促进社会的发展,而不应当成为人类自身发展的障碍,更不能阻碍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以及真挚的情感交流,因而应当借助社会福利制度这一载体号召人们关爱自我,关注社会,增强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关爱与社会责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社会福

利,政府依然是大面积、深层次地干预社会福利领域,所不同的是政府试图建立起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福利。20世纪70年代以前,以英国、瑞典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普遍和周到的福利照顾,几乎惠及所有公民;从生到死的福利保障提高了社会中下阶层对疾病、失业、退休等风险的抵御能力,有效地将个人从物质匮乏和忧虑不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有了更多的自我发展空间;而弱势群体生活有保证,甚至过上了较为舒适的生活,这促进了政治稳定、社会安宁以及国家团结,是社会文明的一大体现。

然而,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依然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说,高福利催生了“懒人”现象。在瑞典,人们工作和不工作的收入相差不到20%,这使得人们不愿从事劳动,也不愿为获得工作而努力提高自己的素养与能力,甚至出现了一些专门依靠社会福利过活的“福利妈妈”“懒汉”等,这无形中败坏了社会风气,更不利于个人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而且,从生到死的福利保障冲击了传统的“家庭价值观”,一些人将对家人的责任推给了政府,也淡化了市民的社会责任感,进一步加深了冷漠与麻木不仁。与此同时,高福利带来高压力。战后几十年中,许多欧洲国家的福利开支不断膨胀,超出了政府所能承受的范围,继而出现财政危机。20世纪70年代后,这些现象更为突出,西方各国开始寻求“第三条道路”,积极改革社会福利。当今国际社会福利变革的主要趋势在于重建社会保障的责任分担制,减少政府参与,强化个人保障意识,充分发挥社团、家庭和市场的作用,培养社会救助意识和社会责任。毫无疑问,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又向前迈了一大步,由单纯的政府司法行为逐渐过渡到社会全民参与,而且更为关注人类自我救助、自我发展及对他人的责任与爱,从而增强市民的责任感与国家归属感,增强了爱国情感。

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从早期的个人善举到中世纪宗教色彩浓厚的社会救济再到近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福利,经过了一个漫长

而曲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越来越多地干预其中,将社会福利当成是当仁不让的国家职责,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此保证弱势群体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并帮助其进一步发展自我、完善自我,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国家、社会把福利接受者当成一个完整的人而使其得到尊重与帮助,赋予了其生存的权利,为之创造发展的可能性,使之成为国家的一分子、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满足其作为一个有用的人的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而非单纯地成为被施舍的对象;国家通过社会福利增强了社会与每一个成员间的联系,增强了人们的集体意识与国家归属感,这当中体现出了社会的温情,洋溢着浓厚的人文关怀,是社会文明的体现。另外,笔者认为,在发展现代社会福利的过程中,除了建立行之有效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以及号召全民参与之外,不应当将教会完全排除在社会福利领域之外。宗教重视人生的意义,强调每个人都有获得爱与尊重的权利,强调对他人的爱、宽容与帮助,从而培养人们的集体荣誉感,促进邻里相互照顾,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因此,我们应当注重并充分发挥宗教思想在现代社会福利建设中不可取代的作用。同时,笔者认为,社会福利的目的在于保障人们作为一个完整的个体获得生存的最基本保障,继而成为社会中的人,成为对社区、对国家有用的人,从而使个人成为一个完善的人,一个获得自身发展与完善的人。因而,福利制度只能是一种手段,一种使人获得发展与完善的手段,一种帮助人们过上幸福生活的手段。关注人类自身的需求与发展,关心个人的幸福感、成就感以及集体荣誉感、归属感才是目的所在,人类自身的发展与完善才是我们目光的焦点。

编委会

总顾问

侯建新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院长，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主 编

张乃和

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张庆海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副主编

龙秀清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毕建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张景全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 洪	凡斤斤	毛欣欣	王 平	王 艳	王艳峰
王 最	代国庆	冯金朋	卢兆瑜	史海波	豆华娜
李 莹	张 美	陈日华	陈 静	范绮芹	杨晓敏
杨晓聪	杨翠红	赵博文	郭少琼	郭丽娜	徐丽丹
谢伟良	藺志强	翟 宇	黎英亮	鞠长猛	

目 录

总 序	001
写在前面	001
第一章 社会福利的含义与由来	001
社会福利的概念	001
社会福利的理论基础	006
第二章 中世纪早期:通向救赎的社会救济	016
穷人:上帝面前的说情者	016
富人:寻找通向天国的梯子	027
教会:社会救济的主体	036
其他形式的社会救济团体	044
第三章 中世纪晚期:虚假的社会福利	052
真穷人的无奈与假穷人的伎俩	052
惩罚与强迫劳动:大禁闭前的各种尝试	062
虚假的社会福利:大禁闭的开始	068

第四章 近代法国:扭曲了的社会福利	081
宗教情感的丧失与福利世俗化	081
地方救济与中央集权的对抗	111
第五章 二战后:以人为本的社会福利	121
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福利	121
福利国家何去何从	154
附 录	172
大事年表	172
参考文献	174

第一章 社会福利的含义与由来

社会福利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区域,人们对社会福利有不同的理解;而不同的社会福利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不同历史时期西方社会福利的实践模式。

社会福利的概念

什么是社会福利

一般认为汉语中的社会福利是由英语“social welfare”翻译而来的。而“social welfare”最先出现在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于1941年拟定的《大西洋宪章》和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中。在学术研究中,“社会福利”作为一个术语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有时指的是一种生存状态,有时则是在指某些制度或某些理论,学者们提出的社会福利概念在表述上更是千差万别,莫衷一是。

《大美百科全书》中对社会福利的定义是:“最常指分门别类的制度与服务,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和提高人们身体的、社会的、智力的或感情的福祉;同时亦指大学的、政府的或私人的方案,这些方案涉及社会服务、社会工作和人群服务等领域,以达到助人的专业目标。”据此,一些学者从人类的生存状态出发定义